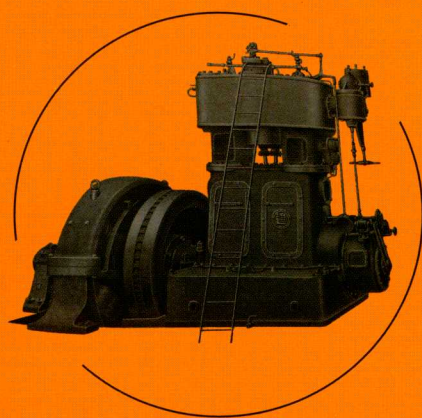


历史学派视野下的工业化

严鹏 著

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 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

(1900—195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学派视野下的工业化

严鹏 著

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
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
(1900—195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

1900~1957/严鹏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2939-9

I. ①战… II. ①严… III. ①机械工业-工业史-中国-1900~1957 IV. ①F4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108 号

责任编辑 曹怡波

封面装帧 张志全

战略性工业化的曲折展开: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
(1900—1957)

严 鹏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8.25 插页 2 字数 451,000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939-9/T·10

定价 68.00 元

序

彭南生

严鹏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出版,欣喜之余,我回想起了他跟随我学习的岁月。

记得那是2005年下半年,我当时为历史文化学院基地班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选修课,其实,选修经济史课程的本科生并不多,在他们看来,经济史枯燥乏味,不如文化史那样绚丽多彩,也不如思想史那样深邃且蕴含智慧,更比不上政治史那般惊心动魄,再加上在本科生眼里,我要求严格,学生很难拿到高分(毕业多年的学生回到母校与我聊天时说,很后悔当初没有选修老师的课,我问其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说老师的要求太严了)。于是,我更加珍惜,不仅将最新研究体会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而且课下常常与他们讨论,严鹏就是其中一个。他考入华中师大历史学基地班后,在导师们的指导下,潜心读书,知识面广,善于抓住机会向老师们请教问题。课后他有时陪我步行,从教室到回家的路上,他与我分享自己读书的见解。我在课堂上结合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重点讨论了中国近代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若干问题,没想到,这不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成为他此后继续深造乃至其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此后,我有意让他接触我的研究课题,搜集一些资料,并进行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开展合作研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其问题意识、解读及运用史料的能力。他的本科论文探讨了工商业学徒,并获得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一等奖,并以优异成绩顺利地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在硕士生阶段,他继续努力,被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硕士论文又被评为湖北省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在博士阶段,他又继续探索,以1900—1957年间的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演变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他将机械工业视为战略性产业,借鉴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战略性工业化的视角,围绕着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在战略性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探讨了中国机械工业曲折的发展历程。为此,作者搜集了大量资料,据我所知,为了写好论文,他不仅沉浸在大江南北各档案馆、图书馆,亲临工业遗址,甚至高价购买了一批流落于坊间的企业档案,为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作者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中抽象出“战略性工业化”这一概念,认为战略性工业化就是指国家为实现其意志而介入战略产业的工业发展过程,机械工业就属于这种战略性产业。发展战略性产业要有先进技术、大规模资本,没有政府的强力扶持难以成功。也正因为如此,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往往就是追赶型的。近代中国也不例外,从洋务运动开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械工业就在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引导下开始起步,但是,晚清政府及随后取而代之的北京政府,由于国势日衰,纷争不断,自顾不暇,难以强势介入,市场的力量渐成主导。作者认为,“自由市场对产业而言构成了双刃剑。由于市场需求结构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机械产业的技术发展受到抑制,本应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机械工业沦为技术能力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情形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伴随着抗战的需要,实施了技术导向型战略,机械工业获得一定的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新政权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机械工业重点扶持,加之苏联东欧技术东移,一个“军事—工业—大学综合体”的机械工业发展模式在中国已然成型。从晚清政府、经过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再到共和国初期的人民政府,历经曲折,战略性工业化终于得以大规模展开。可见,“战略性工业化”既从经济学中吸取了养分,也是对近代中国机械工业发展进程的实证分析后的一种提炼。

作者既尊重历史逻辑,但又不为历史分界线所困扰,按历史时序对1900—1957年间中国机械工业的演化进程进行了考察,这段历史纵贯晚清、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和共和国初期等不同阶段,但是,从机械工业

的演进看,又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只有跨越近代、现代与当代界限,才更加有助于考察后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成长机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结论也才可信且具有启发性,如作者认为:“国家嵌入产业是必要的,但这要求国家统治集团有坚强的战略意志,并以高度的使命感克服牟取小集团私利的倾向,由此形成强韧的国家能力。进一步说,不管在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战略都意味着对于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理性之超越,唯有此种战略意志能使后发展国家追赶先进,而这种战略意志之不易获取及保持,可以解释为何数百年来能改善其国际地位的后发展国家屈指可数。”

学术贵在创新,严鹏博士的学术之路还刚刚开始,他在研究中已经体现了一种志在求新的精神,衷心希望他在学术的道路上初衷不改、矢志求索!

自序

促使我投身于工业发展问题研究的契机，乃是2006年前后的“徐工并购案”。

后世史家在探讨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史时，必会将“徐工并购案”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关于“战略性产业”与“国家经济安全”的辩论，通过网络进入大众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庙堂、产业界以及象牙塔。如果拓展视角来看，这次事件或许也是中国战略性工业演化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此案的是是非非，不必在此评说。然而，在当时的辩论中，形成了两个焦点：第一，是否存在战略性产业？第二，工程机械行业是否属于战略性产业？当然，在这两个理论性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实践性的问题：国家是否应该出面保护本国的战略性产业，抑或听任外资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吞并本国产业？

理论总是实践的先导。这也是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在玩赏性的“为学术而学术”之外的意义。

那时的我作为一个已被保研的历史学本科生，对此事饶有兴味。在中学时代，北约轰炸大使馆事件和南海撞机事件，使我产生了朴素的爱国情感——但和面对拿破仑的黑格尔一样，我本来有另一套想法。然而，我所读的经济学著作，我所听闻的经济学家的言语，并不支持“战略性产业”、“国家经济安全”、“幼稚产业保护”这类颇具爱国主义色彩的字眼。事实究竟如何？我决心研究机械工业的历史，希望看看历史更加支持哪一种论点。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这本书的起点。

当然，这种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不太符合历史学的一般姿态，但我本也不是一定要选择这个专业的。读高中时，当我的同学们每天忙于课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闲书了——这并不妨碍我的高考成绩在湖北省进入前200余名之列。我的曾祖父与祖父都是工商业者，这使我对经济学有某种情愫。我是在高中时第一遍读完萨缪尔森的教材。但是，自从初中班主任指令我当了个历史科代表后，我对这门学科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两者的结合点，自然就是经济史。而我发现

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笔下的恢弘画卷，对我更具吸引力，这是我高考最终选择历史专业的诱因。然而，这也决定了，从一开始我就热衷于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纯粹的历史兴趣不大。

我的这些想法，进入大学后，不断被历史专业固有的秉性所冲刷，幸而我一直能找到一些具有理论思维或至少对理论抱有同情态度的老师。我的导师彭南生教授正是其中一位。无论在公开的课堂上，还是在私下的交流中，导师都强调学习经济学理论对于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自然，这很合我的胃口。我至今也认为，在历史专业有彭南生教授这样的老师存在，对于想要学习经济史的学生来说极为必要。

但很快，我又对理论产生某种质疑了。我看到太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只是生硬地摆出某种理论，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将历史塞入其中。这种做法，使我感到惶恐。更大的危机在于，随着我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了解日益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它是一个自证自足的体系，其实并不需要经验性的历史研究为它补充或证明什么。恰好在那时，大学毕业后的暑假，我心血来潮地第一次踏入档案馆，很快就被那些字迹潦草、纸张枯黄的档案征服了。我体会到历史学的某些乐趣。我开始设想单纯进行考据的研究。读研后，接触了所谓“历史原生态”的观念，我也更加从理论的立场上后撤了。

2008年夏天，某日我在上海例行地查完档案后，逛福州路的上海书城时，发现了一套分为上下册的《穷国的国富论》，但没有拿起翻阅，只是心想这名字很奇怪。当时买了一本高柏的《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回到120块钱一晚的小招待所后，一口气读完，拍案叫好。日本人在崛起时代对于主流经济学的质疑与排拒，深得我心。也是从这本书中，我对德国历史学派这一早被经济学遗忘的流派有了深刻印象。我隐约感到历史学派会给我调和历史与理论带来一定帮助。2009年春，当我在上海查完档案又逛到书城时，发现新书不多，而《穷国的国富论》仍在，遂从书架上取下翻阅，孰料就此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这套文集，收录了一批演化发展经济学的论文，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道统的经济思想谱系，而德国历史学派在这一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通过这套书，我开始重新审视我本就崇敬的李斯特、韦伯、熊彼特，开始深入认识施穆勒、桑巴特、凡勃伦。我既摒弃了那个自证自足的体系，也不想埋首故纸堆中自娱自乐。

尤为令我动容的，不仅是德国历史学派从历史与现实出发的认识论，更是他们鲜明的为德国国家利益而战斗的姿态。在19世纪，德国相对于英国是后发展国

家,德国的幼稚工业一度面临着英国产业的巨大压力,工业化进程中涌现的各种矛盾也撕裂着德国社会。然而,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自先驱李斯特以讷殿军韦伯,无不以伸张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为鹄的,主张以政府力量培育工业来追赶先进,鼓吹建立福利国家以促社会和谐。同样生活于一个正在急速工业化的后进国家,我被百年前德意志历史学派的先贤深深打动,心中同样产生了一种天命的感召。这种感召,是支撑我在所谓学术道路上坚持至今的唯一动力。

读过《穷国的国富论》后,我联系到了该书编者贾根良教授,在贾老师的指点下,对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学习层层深入,直至开始用历史学派的眼光来审视世界范围的工业化问题。必须要感谢的,还有朱荫贵教授与路风教授,我几乎是鲁莽无礼地去主动联系他们,向他们请教。不管怎样,我形成了一种跨越历史学、经济史学、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尽管还很幼稚,尽管并不被很多人接受,但我依然会在这条德国历史学派早已开创的跨学科的道路上走下去。

就在写下这篇自序的同时,我国政府正在推动“装备出海”,这是本书研究主题的历史延续。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围绕着“混改”,徐工集团又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波澜。是的,这些是活着的历史。我为这些活着的历史而斗争、而沉思、而悲喜、而前行。这是来自生命的强力意志。恰如歌德所言: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2015年清明节

目 录

序/彭南生	001
自序	001

导 论 战略性工业化

一、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	001
二、对学术前史之梳理	019
三、框架设计与结构安排	029

第一章 战略性工业化的启动与受挫 (1900—1927)

第一节 清末国家与市场对机械工业的双重引导	032
一、清廷对战略工业之培育	032
二、市场对机械工业之诱导	038
三、国家与市场的协同作用	041
四、参照系：明治日本的机械工业	044
第二节 民初国家失序下机械工业的自发演化	048
一、市场支配下机械工业的发展与危机	048
二、国家保护缺失下的企业自救	067
小结	082

第二章 民族危机与战略性工业化重启 (1927—1937)

第一节 市场对机械工业发展的抑制	085
一、产业技术的低端化：以农机工业为例	085
二、战前机械工业的劳动密集化趋势	098

三、企业制造高端技术产品的成败	109
第二节 战备压力下国家对机械工业的引导	123
一、南京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蚕食之战略	124
二、南京国民政府推动机械工业发展之举措	133
三、战前东亚工业化道路之竞争	148
小结	156

第三章 战争刺激下战略性工业化的加速 (1937—1945)

第一节 战争对机械工业地理格局的重塑	159
一、国家主导东部机械工厂内迁	159
二、国统区民营机械企业的发展	166
三、敌占区机械工业之演化	177
第二节 战时国营机械企业的壮大	194
一、后方国营机械企业的发展概况	194
二、资源委员会领军企业承担国家战略	202
三、高端部门:航空发动机工业之萌芽	218
四、普通部门:国家资本介入农机工业	223
第三节 战时政策下国家对产业之嵌入	230
一、选派机械技术人才出国实习	230
二、编订检验规范培育机床工业	236
三、依靠订货政策维持产业发展	244
小结	254

第四章 政权交替时期战略性工业化之顿挫 (1945—1949)

第一节 战后中国机械工业的重组	257
一、开放性自由市场之重启	258
二、机械工业地理格局之再塑造	264
第二节 国家在机械工业中扩张的多重面相	269
一、国家资本之膨胀与国企技术弱化	269
二、国营企业对民营企业之吸纳	280

三、非国营企业对国家权力之认同	292
第三节 自由市场重启后机械工业的衰颓	303
一、政策转向与机械工业的行业危机	303
二、国家再嵌入产业之失败	308
小结	314

第五章 战略性工业化的强势展开 (1949—1957)

第一节 强势国家嵌入机械工业	316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确立	317
二、机械工业管理体制的建立	323
三、国家权力对机械工业全面渗透	330
第二节 机械工业技术演化路径之变更	344
一、对苏联与东欧技术的大规模引进	344
二、社会主义研发模式之构建	353
第三节 军—工—学综合体之形成	371
一、军—工—学关系之协同演化	372
二、中国大陆机械工业发展之绩效	381
小结	390

结 论 战略性产业演化的历史逻辑

一、影响战略性产业演化的相关因素	392
二、市场对后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抑制作用	395
三、战略意志对后发展国家的重要性	398
余论：战略性工业化的普遍性	401

参考文献	403
------------	-----

后记	434
----------	-----

导 论 战略性工业化

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工业化是各国借以展开权势竞争的重要手段。因此,工业发展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包含着宽广的政治维度。对后发展国家(late development state)而言,工业化更常常与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缠结在一起,赋予其经济发展以战略意涵。本书拟以中国机械工业的早期发展为个案,探讨战略性产业的演化机制,总结后发展国家新兴产业成长的经验与教训。

一、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工业化早已展开大量研究,然而,对于后发展国家工业演化的动力机制,以及国家是否应扶植特定产业,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且这一争议已持续了数百年。本书之旨趣即在于发挥历史学之优势,通过经验研究为上述理论争议寻求一个可能性的解答。但在梳理相关争议之前,有必要先界定“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

(一) 何谓“战略性工业化”?

“战略性工业化”乃原创之概念,但从已为世人习用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这一术语中,可辨识该原创性概念的合理元素。

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国际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则。比较优势原则认为,若各国专门生产和出口其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就会从贸易中获益。^①由此,各国应利用其固有资源禀赋展开自由贸易,以增彼此福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无为而治。然而,二战以后,前有败战之国日本大力扶植高端产业,晋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有新造小邦韩国亦步亦趋,在全球商战中咄咄逼人,一时

①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之间,欧美列强疲于招架,自由贸易学说颜面扫地。美国学界痛定思痛,遂有“新贸易理论”诞生,以解释日韩何以违背比较优势原则却能国势日隆。要之,政府和厂商乃是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战略性博弈以获取利润的行为主体,贸易政策能够影响博弈的基本结构,可以被用来扶持某些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从而使本国获益。^①此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反放任自流之陈说,正视民族国家疆界线对利益的分割,强调政府干预可人为重构比较优势。^②而为了重构比较优势,政府需选择某些战略产业加以培育,由此,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工业发展之间,实有密切关联。换言之,政府扶持某些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是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础。从逻辑上推论,若一国工业化以政府扶持战略性产业发展为显著特征,即可称其为战略性工业化。

从系谱上追溯,战略性贸易政策只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一宏大体系在20世纪后期的展现。然而,在近代历史上,重商主义并非一种单纯的经济思潮,用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的话说:“在它的核心深处,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国家的构成——非狭义的国家的构成,乃国家的构成与民族经济的构成同时举行;在近代意义中所谓国家的构成,系指由经济的集合体中创造出政治的集合体,并由此使它具有一种高深的意义而言。”^③这表明,以重商主义为名的那种经济运动,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自身的同一历史进程。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战略性贸易政策及战略性工业化,将赋予其更多意涵。因此,战略性工业化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为实现其意志而介入战略产业的工业发展。

定义是简明的,但对定义中的相关概念必须进一步阐释,以便清晰地界定研究范围。这些概念分别是:国家,国家意志,以及战略工业。

① 巴巴拉·斯潘塞:《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什么?》,保罗·克鲁格曼主编:《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② 例如,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并非自由贸易的产物,而是日本政府有计划的政策推动的结果。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培育本国产业,使其免受外国竞争,直到本国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及水准。这段历史可参考:米歇尔·博鲁斯等:《创造优势:政府政策如何影响半导体产业的国际贸易》,保罗·克鲁格曼主编:《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第83页。

③ 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1页。毫无疑问,重商主义是一个庞杂而不易把握的概念。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即批评施穆勒过于强调重商主义的政治性而忽略其作为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体系的本质。然而,尽管赫克歇尔撰写了关于重商主义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其历史视野却不及施穆勒的小册子开阔。赫克歇尔的论点见: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9.

国家,从最表层的意义上说,是对一定地域内有组织暴力的合法垄断。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最能表明国家机器特征的两种机构,是官吏和常备军。^①这意味着在维系阶级统治的同时,国家须履行对内治理与对外防御的职能。然而,一旦将国家视为履行职能的行动者,国家就不能被简单地看成一个整体。从理论的角度说,可以假设一种关于国家的理想型(ideal type),在这个理想型的一端,国家是不同利益团体的角斗场,斗争胜者将使国家执行有利于本团体利益的政策;在理想型的另一端,国家将表现出高度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国家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反映特殊小团体利益的目标。在现实中,国家的形式会分布于上述两端的区间内,从而产生弱国家(weak state)与强国家(strong state)的分别。一个极端的弱国家将变成国内各派别争夺公共权力的战场,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所谓强国家,却并非意味着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专制、独裁,而是指国家自主性较高,从而具有实现超越小团体利益目标的较强能力(capacity)。^②以国家能力作为衡量标准,一个看似分权的现代民主国家可能是强国家,而一个看似集权的传统农业帝国可能是真正的弱国家。^③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国家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由弱国家转变为强国家。因此,本书所理解的国家,是一个其自主性会随时变化的制度,但这种变化在主观上具有方向性,即趋向于增强国家能力,至于客观绩效如何,则受限于包括内部小团体斗争结果在内的约束。

实际上,在假设了国家具有自主性之后,所谓国家意志才可能成立。因为,如果国家只不过是各利益团体的角斗场,那就不可能存在超越性的国家意志,甚至连国家利益也不存在,而只有各争权夺势之小团体的意志与利益。然而,在国内各小团体的利益之上,还存在着整体性的国家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体系的特性决定的。现代世界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与大一统帝国不同,民族国家是具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② 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彼得·埃文斯等编:《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页。

③ 福山说:“我们必须将国家体制的运作范围与力量强弱区分开来,前者是指政府施政的各种功能与目标,后者则是国家拟定与实施政策、执行法律并兼顾廉洁与透明的能力。”换言之,强国家不是指政府无所不管的国家,而是指政府施政效能较高的国家。见:法兰西斯·福山:《强国论》,阎纪宇译,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3页。

有领土边界的行政主体,实际上,民族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体系性关系之中。^①这一现代体系的起源不便在此追溯,但其结果颇具意义: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作为独立实体的各民族国家有着彼此竞争的利益。从理论上说,如果一国的统治集团无法越过国界从他国统治者处分一杯羹,该集团势必立足于本国而稳固其统治,这样一来,国家的继续存在对统治集团至关重要,而国家整体利益也将落实——因其与统治集团的利益高度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独立是最大的国家利益,而维护独立成为国家的最高意志,统治集团在以国家为牟利工具的同时,也成为国家意志的代理人。这种国家独立之争本是欧洲各宫廷的王朝争斗,但随着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兴起,国家间的对立有了日益扩大的民众基础。^②随着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扩展至全球,这种国家竞争模式也被复制于世界各地。因此,本书所理解的国家意志,是指国家维护生存与独立的决心,国家的生存与独立所带来的利益,在理论上与其统治集团的利益相一致,并惠泽全民。自然,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实际情形千差万别,但这种假设可以解释民族国家仍未消亡的事实,并简化研究中须处理的变量。

在明确了国家具有维护生存与独立的决心之后,很清楚的是,国家也需要实现这种意志的手段。从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之初,战争就是最主要的手段,实际上,“在所有的国家活动中,战争准备和战争活动仍然是整个国家活动发展过程的核心”^③。自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无大国直接冲突的大范围和平仅存在于二战以后,但这一和平的成因并非国家改变了其自利本性,而是由于核武器这一“绝对武器”的威慑力。进一步说,各大国的军备竞赛仍属于为战争做准备,其和平不过是一种“冷和平”。在近代,战争与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赢得战争,统治者必须殖产兴业,积极创造物质基础。因此,经济发展对于国家而言,是与他国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在此种为国家意志服务的经济演进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①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② 兰克(Leopold von Ranke)在追述了近代以来欧洲各国挫败法国独霸欧洲的企图后写道:“其他国家战胜、并将我们纳入其版图的那种统治,遭遇的唯一敌手就是我们自身国民性(the nationalities)的发展。在这里,我并不是捏造、虚构一种国民性,实际上,这种真实存在的国民性体现在国家政府中。”兰克在此揭示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并表明这种力量与统治集团有密切关系。不管兰克的论断是否完全正确,其论断本身显示出19世纪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现实政治的结合,这种结合延续至今。引文见:利奥波德·兰克:《论列强》,罗格·文斯编:《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③ 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内部孕育着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分化,“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①。为了摆脱边缘化的地位,选择某些产业作为突破口,以之带动整个经济的提升,成为资源有限的弱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向上攀爬的不二之选。这些被挑选出的产业因此具有“战略性”。在当代中国,此种战略性产业被赋予双重含义:其一,关乎国家经济和军事安全;其二,对其他产业具有定向的引导性。^②那么,哪些产业符合这两条标准呢?其实,在早期的工业化理论中,张培刚已经将产业视为生产函数,区分了“战略性(Strategical)生产函数”(中文本译为“基要的生产函数”),以及因战略性函数之变化而引发变化的“被诱导的(Induced)生产函数”。在张培刚看来,工业化即由战略性生产函数引发的连续变化的过程。^③具体而言,战略性生产函数“大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④,指“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被诱导的生产函数则指纺织工业、制鞋工业等轻工业部门。因此,张培刚实际上论证了只有重工业部门才具有引导作用。同时,重工业部门与军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此意义而言,战略性工业当指提供资本品的产业,这些资本品除一部分武器装备外,主要应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的较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⑤,这从一般意义上肯定了资本品生产的战略属性。由此,可以认为战略性工业是与一国军事力量有直接关联,在经济上又具有技术引领性的产业。

综上所述,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可以由定义扩展为:一国为维护其生存与独立,在工业化进程中重点培育与国防有直接关联且具有技术引领性之产业。毫无疑问,这并非工业化的唯一类型,甚至可能并非其主要类型。同时,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说,这未必是好的工业化类型。然而,若进行价值判断,则国家之生存与独立的意义同在拷问之列。因此,本书拟采取价值中立原则,仅预设国家追求生存与独立乃本性使然的客观现象,而本书的关照,亦仅在于真实世界中的国家为何会产生战略性工业化,其成效又应如何评估。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央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② 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2011中国产业发展报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③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曾启贤等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5页。

④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第65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